

客家研究文集

——热烈庆祝桂林客家海外联谊会
成立大会召开

桂林客家海外联谊会 编
客家学术研究会

1995年9月

目 录

客家与客家研究的几个问题

.....钟文典(1)

客家文化漫谈

.....彭会资(18)

广西境内客家方音的主要差异简述

.....李谱英(37)

客家精神举要

.....刘泰隆(42)

广西客家人的来源及分布

.....熊守清(50)

编后记.....潘香华(65)

客家与客家研究的几个问题

广西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钟文典

客家是汉民族中的一支重要民系。它的先人原居我国北方。它有自己的方言,有自具特色的物质文化、精神文化和社会文化。这些结论,已经成为众多客家研究者的共同认识。在研究客家民系的源流时,有的学者虽然说过:“客家是中华民族里的一支”。但是,并不意味着客家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居于汉民族之外的一个民族。^①长期以来,也曾有过客家“非汉种”,^②或客家乃山地中“野蛮的部落,退化的人们”,^③或者把客家视为少数民族等等说法。但是,问题一经提出,即有人指出其谬误,不能成立。^④

但是,关于客家的源流,有些问题也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,如:“客家民系是南迁以后才逐步形成的,或是在北方早已存在的?它的形成,是单元一系,或是一系多元?对于前者,南迁形成说似已成为定论;对于后者,则论者尚有意见分歧。在此,我想谈些粗浅想法,希望得到学者方家的指教。

首先要问：“客”从何来？

一种传统的说法认为：客家的先民原来生活在北方，主要在中原，其范围大致在今日的陕东、鲁西、晋南和鄂北的广大地区，即我们通称的中州大地。由于战乱或其它政治、经济等原因，从秦汉以后，尤其是西晋以后，客家的先民大量南移，跨黄河，渡长江，其中一支抵达江西、福建、广东三省交界的地区，与当地的畬族互为影响，终于形成了客家民系。其形成时间，早者说在五代时，晚者说在明末清初。

但是，从几个有关客家民系的根本问题考察，我们有理由认为，客家本来就是生活在北方的“土著”居民，汉民族中的一支民系。在漫长的往南迁徙过程中，和百越诸族互相交流，互相影响和互相融合，有的转化为汉民族的其它民系或其它民族的成员，有的则在交流过程中影响和融合了别的民系或民族的居民，保留了客家的本色，即今日遍布海内外的客家。

我们说客家本北方“土著”，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得到说明。

因为客家来自北方的广大地区，辗转南迁，易地为“客”。为了不忘自己的根本，十分重视堂号；而堂号多以其先祖所居之郡地而来，是以堂号又常能反映其姓氏发祥或望出所在。且以我国几个大姓为例：李姓堂号“陇西”（秦置郡，在今甘肃陇西县），陈姓堂号“颍川”（秦置郡，在今河南禹县）^⑤，黄姓堂号“江夏”（汉置郡，在今湖北云梦县），张姓堂号“清河”（汉置郡，在今河北清河县），^⑥刘姓堂

号“彭城”（汉置郡，在今江苏徐州）。^⑦各个姓氏的堂号（郡号、望地），以及与之相关的堂联，都可以说明他们的根基、“世泽”与“家声”。而客家人的谱牒，更多地记载了他们的先祖自北南来的足迹。

客家方言是客家民系的重要标志，也最能反映客家传统文化与民系特色。据专家学者的考证，客家方言与中州词语、音韵有深厚的因缘。温仲和纂《嘉应州志》卷七《方言》，列举客家方言称人、述事、说物词语及谚语近300条，皆可从古籍、古语及其古韵、古义中得到例证，说明“嘉应之话，多隋唐以前古音”；或云客家“语言多合中原之音韵，其说皆有所考据”。^⑧章太炎撰《岭外三州语》，从温仲和的《嘉应州志·方言》和杨恭桓的《客家本字》所记嘉应州、惠州和潮州的客家方言中，选取单词或词组60余个，用《说文》、《尔雅》、《方言》、《礼记》、《毛诗》、《老子》和《战国策》等经典加以对照、解释，论证了他对客家方言“雅训旧音往往而在”的认识，说明客家方言是保存了不少上古语音、词义的一种汉语方言。^⑨罗香林在《客家研究导论》第四章中，对客家方言的词类、音读、语法的调查、分析，以及它的源流、变革的辨证、考释，论者谓据此“可知客家与古代中原汉族之语言息息相通，于是客家为汉族嫡派以明”。^⑩有的论者，更从江西、福建和广东的客家方言，举出不少实例，与古籍、古诗词相对照，得出了客家方言仍保留不少中原古韵的相同结论，^⑪还有学者认为，在客家方言中，“含有许多古代雅言的成分”。^⑫

客家人的风俗习惯，亦多承传于历史。温仲和《嘉应州志》卷八《礼俗》，言及当地客家人之劳作、起居、饮食、衣着、婚嫁、丧葬、祭祀等礼仪、习俗，亦多古代遗风。张

祖基等著《客家旧礼俗》，洋洋数十万言，对客家人的岁时、婚嫁、生育、丧葬诸礼俗，各种生活习惯，以及各种术数、鬼神迷信，自然与精灵崇拜等等，皆有论及；而其结论，则曰：来自“豫、鲁、晋、秦等地的客家人，才是所有客家人真正的老本家，……其语音习尚，至今仍保持着他们祖先所遗传下来的”。^⑬

黄遵宪论客家人，曾有诗云：“筚路桃弧辗转迁，南来远过一千年；方言足证中原韵，礼俗犹留三代前”。^⑭正可作为我们上述三个方面的最好概括。客家的祖居老地在北方，南迁千百年，风习、语言仍是中原风韵，这种独特现象，不正说明客家民系早已生活在北方，无需经过南迁后才逐步形成了么？

三
再问：今天的客家民系，是来自单元一系、还是一系多元呢？

有的论者认为，客家人的祖先从中原迁来，“是纯粹的汉族”^⑮换言之，客家民系是单元一系的。

这种观点，值得商榷。

从理论上说，天地万事万物都是互为联系，发展变化的；所谓“纯粹”或不变，是暂时与相对的。具体说到客家民系，只要考察一下它自北南迁的历史，就不难了解，它并非、亦不可能单元一系，而是一系多元的。

我们说客家民系来自北方，经历长期的辗转迁徙，仍保留自己的方言、风习与特性，有两个问题值得注意，一是促成北人南迁的动因，主要由于战乱和征调，如秦开岭南，汉

征交趾，西晋的“八王之乱”，东晋时旧史所称的“五胡乱华”，唐中期的“安史之乱”，唐末年的黄巢起义，两宋时期的金、元南侵，以及明末的农民大起义，清兵南下，等等。其中宋、元之前的战乱，出现了北人南迁的大潮，而明、清以后，则多属江南各省的内部流动转徙。除了历代战乱、征调造成的迁徙、流动大潮之外，还有因仕宦、商贸、谋生以及喜爱南方水土而迁徙的涓涓细流。这种情况，在南迁客家和其它民系居民的谱牒中也有大量反映，值得我们注意。

另一个问题是，我们说北人南迁，绝不是说历史上所有南迁者都是客家人。须知与之从北方南来的还有汉民族的其它民系或其它民族的成员。即令是南迁的客家人，由于在迁徙过程中各自的走向不同，居地各异，他们与南方百越各族居民的联系程度也多有差别。沿海的吴越、八闽、南唐、南越和内地的楚湘地区，曾分别出现过吴、越、八闽、南唐、南越和楚等政权，社会经济、文化比较发达。所以，客家民系或其它民系、民族的成员南来，进入这些地区，处于新来的“客”位，人数既少，政治、经济实力亦居劣势。因此，自己原有的方言、风习与特性逐渐被淡化，进而被先入为“主”者所同化。其后裔很可能成了江浙人、福佬人、广府人、楚湘人或其它民族的人。而移居至皖南、赣东南、闽西、粤东、粤北、湘南以及桂东南等地的客家移民，由于这些地方处于腹地山区，地广人稀，风气闭塞，其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也比较落后，这就有利于客家移民发展其物质的、精神的和谋生技能的优势，使他们有可能保留自己的方言、风习与特性，进而以自己的优势影响直至同化周邻民族或民系的土著居民，处于后来居上的地位。在赣南、闽西、粤东之间形成的客家中心及其与当地

畚族的交流与影响，就是典型的事例。由此可知，在客家民系南迁的过程中，因与周邻其它民系或民族居民的交流、影响，天长地久，都是尔中有我，我中有尔，多元一系的，只是看谁在交流、影响过程中居于主体地位而已。

一个民族、一个民系如此，一个姓氏，虽曰同祖共宗，但由于在不同时期、不同途径的多次迁徙，各走西东，在不同的地区与不同的民系、民族的居民发生接触、交流，日久年深，也必然发生分化。且以黄姓为例。据“黄氏谱牒”记载：黄峭，字献瑞，名实。生于宋太平兴国三年（978年），登祥符元年（1008年）进士。“初官江夏太守，……娶三妻，……各生七子，共二十一子，八十三孙。因世乱纷纭，于嘉祐四年正月初二日（1059年2月16日）置酒邀亲友，召诸子训曰：‘余年已迈，将有九泉之处；人口蕃衍，供给浩大，家业无多，何以为子孙长久之计？吾曾经过闽、粤等处，山环水秀，田地饶沃之所，指不胜屈。今将家业作二十一份均分，留长子侍奉，诸子分往各处，诚有孝心念我者，何异我在乎？有诗一首，登程执别’。”由是子孙散住江浙、豫章、岭南各州邑。后世黄氏“念诗符合，即属宗派”。^⑥他们分居后的地区不同，一脉百派，也就出现了方言、风习、思想意识上的差异。黄姓如此，其它姓氏人口蕃衍分流的结果，日子久远，也多有类似情况。

千百年来，客家民系的南迁及其在南方以至海外的蕃衍、发展，经历了一个漫长的、艰辛奋斗的历程，它和其它民系、民族的交流、融合过程中，既有所分化，又常在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中丰富和壮大了自己。为了谋取生存与发展，他们还以自己的勇敢和机智，反抗强暴者的欺凌，抵制各种邪恶势力的侵扰，战胜各种自然灾害，在恶劣的环境中披荆斩棘，开基立

业。艰难困苦铸就了客家人勤劳俭朴，勇敢刚毅，互助合群，敬宗崇本，爱国爱乡和开拓进取等积极精神；而居住地区长期的和相对的处于封闭状态，又养成了某些消极的性格。总而言之，客家人的千秋创业，用血泪与汗水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添加了多采多姿的一页。

四

有必要说一下广西客家的发展史。它将有助于我们对上述两个问题的理解。

客家人是什么时候进入广西，开基立业，蕃衍发展的？不少论者认为客家人进入广西是在明、清之际。^①但是，查考史籍及客家谱牒，早在唐代或更早，即有庞氏之族迁入广西博白；民国年间，“丁口二万五千有奇”，成为县西之客家大姓，^②另有记载说：“钦（州）廉（州）客家始于五代”者。^③到了宋代，客家人入钦廉者已经不少。宋太宗（976—984年）时人乐史撰《太平寰宇记》，说廉州“俗有四民，一曰客户，解汉音”。到了南宋，北来客人成为钦州五民之一。^④广西的博白、陆川、北流、容县（宋代称普宁县）与廉州、钦州相邻，博白李氏、陈氏皆邑中客家大姓，陈氏宋初来自浙江，李氏两支，一支来自河南，一支来自福建。^⑤而陆川、北流、容县新编县志，皆记客家迁入邑中定居，最早者亦始于宋代。桂东南的信都县（宋属贺州，今并入贺县），有罗、欧、麦等34姓、100余户因“天灾地劫，众不堪命”，于南宋时“从广东南雄府迁来，开辟荒土，结草为庐，耕种自食”。桂东北的富川县，有杨氏之族，分三系，于南宋末年分别从广东及梅州等处迁来。^⑥而

桂北的怀远县（今三江县），宋大观元年（1107年），因避金兵侵扰，有曹、龙、李、潘等21姓人家，从福建汀洲府上杭县经广东梅州入桂，溯柳江、融江而上，入居县属之老堡、古宜；继之，又有唐、张、莫、梁等20余姓人家，亦从福建汀州迁来，居于文村、六甲等处，实为三江最早之客家人。^③细考民国年间调查之各县“氏族”入桂定居记录，宋代迁来者尚有不少。所以，到了南宋，客家话成了当时广西流行的方言之一。时任桂林通判的周去非，对此作了专门记载。他写道：

方言，古人有之，乃若广西之菱语。……至城廓居民，语乃平易，自福建、湖湘，皆不及也。其间所言，意义颇善，有非中州所可及也。早曰朝时，晚曰晡时。以竹器盛饭如篲曰簞，以瓦瓶盛水曰罍。相交曰契交，自称曰寒贱；长于我称之曰老兄，少于我称之曰老弟，丈人行呼其少曰老侄，呼至少者曰孙，泛呼孩提曰细子。谓慵惰为不事产业，谓人讎记曰彼其待我。力作而手倦曰指穷，贫困无力曰力匱。令人先行曰行前。水落曰水尾杀。泊舟曰埋船头，离岸曰反船头，舟行曰船在水上。大脚胫犬曰大虫脚。若比之类，亦云雅矣！……^④

这些地道的客家话在南宋时已经成为广西五种方言之一，说明客家人入桂当在北宋或更早，客家在广西，尤其是桂东南、桂东北地区的分布已经相当普遍。

元代，虽然社会动荡不安，而客家入桂者亦不少，主要的如：广东兴宁人刘贵魁，元初出仕桂林，即定居不再去；其另支族人迁居梧州路苍梧县。^⑤广东梅州人杨文成、杨文昌兄弟，元初率家人迁入柳州路柳城县。^⑥同在元初，福建汀州府宁化县刘衍官知平乐府事，即定居平乐许湾乡。稍后，有进士邹德宏之子孙从广东梅州长乐县（今五华县）迁居平

乐。江宁人钟朝富以进士授平乐通判，卜居贺州。而福建汀州府上杭人刘潜、刘昌兄弟与其堂兄弟刘育千，皆以仕宦广西而分别定居于郁林州之郁林（时为兴业县、南流县）、贵州及博白县。^{②①}宋末元初，曾任广西提刑使司之广东东莞人钟宜万，因参与抗元兵败，避居于郁林州之东宁乡。^{②②}又有陈朝奉者，浙江天台人。宋末，任雷州刺史，卒于任所。时“宋祚告终，鼎移元室”。朝奉哲嗣七人，“凛君臣之大义，痛国家之沦亡，……逐弃簪纓，而以耕读为业。择居广西博白，开疆辟土，各经自营”。此后子孙日众，分居防城各处。^{②③}综观元代入桂之客家人，以姓氏论，有刘、黄、唐、罗、钟、陈诸大姓。从迁出地论，则以江西、福建、广东及江浙为多。迁入地仍集中在桂东南、桂东北比较发达的州县。考其移居原因，则以政治因素为主，即奉命出仕广西，或誓不仕元而避居不去，出于经商或垦荒谋生的原因，则少见记载。

明代，广西虽然发生了大藤峡、八寨、府江和古田等地的瑶民反明斗争。但终明一代，各地移民入桂者日益增多，其中包含大量的客家人。他们的足迹，几乎遍及广西各府的大部分州县。例如：明万历十八年（1590年），有曾思联者“由山东邹平县徙广西桂林开基立业”，基后子孙蕃衍，形成今日临桂六塘、南边山与阳朔金宝乡的大姓。^{②④}同在万历年间，有丘姓自广东翁源县徙居昭平县马江，其后亦成为邑中大姓。^{②⑤}当时，即所谓“僚蛮盘错，山川险怪，丛篁深菁”的永安州（今蒙山县），也开始有了客家的移民。据统计，有明一代，从广东梅州、肇庆府等地迁入永安州的客家人，已经有30余户（族）之多。^{②⑥}明天启年间（1621—1627年），广东英德县之陆盛情在刑部为官，因故获罪，偕子女十人逃

避梧州，以后分居藤县、昭平、永安、平南、桂林、平乐各州县。^③明末，广东兴宁人刁宗颜，以干员优行出身，为广西平乐府富川县知县，遂留居广西，“是为广西刁氏之祖”。^④陆川县罗氏之族，系分十八，大半于明末来自江西吉水。^⑤北流县民乐乡柘根山凌氏之族，明景泰时（1450—1456年）来自广东梅州。今容县、桂平凌氏多其后裔，^⑥柳州府柳城县邓氏之族，其先祖邓积善于嘉靖年间（1522—1566年）携妻及弟自河南南阳经湖南入桂，”止于邑之大埔，始定厥居，卜筑处即今之邓村，^⑦罗城县新村谢氏之族，于明嘉靖年间从福建汀州迁居罗城，在大梧村外自成村落，即谢村，^⑧其它如庆远、南宁、太平、镇安、思恩各府，以及桂西边远的土州、土县，因仕宦、征调、戍守卫所等原因，亦有不少客家人从江西、福建、广东、河南以及江浙各省移居广西。

清代，各地客家迁入广西定居者更多，从康熙至嘉庆的150多年，是客家人从广东、福建、江西、湖南等省迁徙广西的高潮期，由是出现了广西人口的迅速增长。据统计，清顺治十八年（1661年），广西全省人口共58万余人，到了乾隆十八年（1753年），全省人口为1976000人。再至乾隆五十一年（1786年），全省人口为6274000人，33年间，净增人口计达4298000人左右，出现了广西人口增长的大高峰。^⑨其中当有不少是从外地来的客家移民。他们成群结队地向广西迁移，主要是为了“易地谋生”。所以，除定居于沿江依河的平原大垌外，更多的是向山区转移。贵县的龙山，桂平的紫荆山，平南的大同山，藤县的大黎山，桂南的六万大山和十万大山，临桂南边山，阳朔金宝等山区，以及龙胜、百色等边远山地，都有不少客家人迁入定居立业。道光年间（1821—1850年），因为“世乱”，客家人向广西迁徙的势头相

对减缓。太平天国起义前夕，浔州地区发生了激烈的“来土械斗”。太平军在桂平金田村誓师起义以后，以客家人为主体组成的太平军，在咸丰二年（1852年）北上湘鄂，东下江南的大进军中，有两万多客家儿女结队同行，形成了一场具有明显政治开拓性的集体向外大迁徙。咸丰、同治年间（1851—1874年），广东肇庆府的开平、恩平、阳春、鹤山等地又发生了一场延续十余年的“土来械斗”，客家人被逐或被官府遣送入桂者以十数万计。梧州、桂林、平乐、柳州、南宁以及玉林各府州县，都留下了这批“落难者”的血泪迁徙史^④。几乎与此同时，粤北、粤东地区也发生了宗族之间的械斗，嘉应州的李、邓、江、黄、戴及刘氏诸族人被迫向合浦的涠洲岛转移。从此，客家话与黎话成了涠洲岛和斜阳岛的主要方言。^⑤光绪、宣统年间（1875—1911年），由于广西久经战乱，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。而福建、广东等沿海省区的客家人多向海外转移，已经定居在广西的客家人亦有转向海外谋生的^⑥，1911年辛亥革命以后，除了已经入桂的客家人在省内移动外，外地客家迁徙广西的更为稀少了。

纵观历时千年的广西客家移民史，反证了客家南来后始逐步形成客家民系说之可疑。事实说明，当客家移民大量向南迁移之时，粤西、桂南和桂东北等地也已有客家人迁入。所谓客家人迁居广西在明、清之际并不确实。客家入桂以后，在博白、宾阳等地称“新民”，与“地老”对应；在桂东、桂中广大地区多称“客家”或“来人”，乃与“本地”或“土著”相对。因为家客人自称为“艾”，客家话发问曰“麻介”，所以，亦有被称为“艾人”或“麻介人”的；客家话则称“艾话”或“麻介话”。因此，拘泥于何时始有“客家”之名而定客家民系确立之说，亦不可取。

当前，广西客家人数统计近500万人，占自治区总人口的十分之一强。他们分布在全区70多个县（市）之中，尤以博白、陆川、贵港、桂平、北流、平南、贺县、昭平、鹿寨、柳江、柳城与合浦等县（市）为多。在历史上，广西客家在太平天国革命、中法战争、辛亥革命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，都做出了积极的贡献，在当前的改革开放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亦多有建树。但是，我们对广西客家的历史和现状还缺乏调查研究，可说是处于空白状态。这个缺陷，有待于我们努力予以填补。

五

最后，谈谈有关客家研究的问题。

关于客家的历史，总的说来，还缺乏系统、翔实的记载，仅能从某些史籍与私家著述中零星捡得。19世纪中叶，即道光、咸丰、同治年间，由于土客的矛盾、斗争日益激烈，成了当时严重的社会问题。于是，客家民系及其历史才逐步引起中外人士的关注，启动了对客家问题的研究。本世纪20年代以后，客家问题的研究出现了短暂的繁荣，出版了一批中外学者撰写的专著与论文，主要的如：20年代以前，杨桓的《客家本字》；章太炎的《岭外三州语》；20年代以后的有：罗香林的《客家研究导论》，古直的《客家对》，山口县造的《客家与中国革命》等数十部（篇）。1949年以后，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，大陆学者对客家的研究基本中止；而台湾、香港和国外学者却继续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。如：陈运栋的《客家人》，邓迅之的《客家源流研究》，雨青的《客家人寻“根”》，张祖基的《客家旧礼俗》等。改革开放以后，

客家研究重新成了大陆学者探讨的重要课题。福建、广东、江西、上海和北京等地的高等院校、科研院所与一些地区成立了客家研究的专门机构，并且加强了和港、台以及国外学者的学术交流，数十年的努力耕耘，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成果，并且把建立“客家学”提上了议程，令人感到振奋。

但是，回顾客家研究的已有成果，毋庸讳言，也存在着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。

一是过去的研究偏重于客家的源流、迁徙、方言、歌谣、风习、居室、妇女、人物和民系特性等方面。这当然是必要的。美中不足的是，对于有关省区客家人的历史与现状，他们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生活及其与周邻居民、民族的关系等等，则缺乏深入的实际调查研究。没有区域的、个案的研究，则整体的研究也难以深入与发展。

二是在以往的客家研究中，注意了文献资料的发掘、收集与征引。这当然也是必要的。但是，应该看到，社会在发展，人们的思想意识、生活状况也在不断地变化、前进，过去的文献资料并不能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改变，前人的记述也无法讲清不断发展变化的现实问题。因此，深入客家社会开展实地的调查采访，以补文献资料的不足，应该摆到我们的工作议程中来。否则研究的成果只能陈陈相因，难有新意。

三是研究客家的目的在于了解过去，批判继承客家历史文化的精华，使之为现实服务。因此，在研究中必须坚持历史唯物的观点和唯物辩证的方法，全面、联系和发展地观察问题。土楼、围楼、围龙屋等民居建筑，虽然具有浓厚的客家传统文化特色。但随着封建社会的解体，封建族权的崩溃，以及家庭经济结构的变化和思想观念的更新，聚族而居

已不可能。因此，它们也只能作为历史文物供人观赏与研究，无法、也没有必要再予发展。客家山歌虽然是客家文化的艺术珍品，至今仍是人们交流思想，抒发感情的重要艺术形式。但是，时至今日，我们不能为了弘扬客家文化，要求后生只唱客家山歌，不唱时代歌曲。社会在前进，客家人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也应该顺乎世界潮流，合乎人群需要而前进。如此才能生生不息，健康长寿。固步自封，抱残守缺是没有出路的，

广西是客家人居住的重要省区之一。由于历史传统的影响和地区实际的制约，广西客家和其它省份的客家既有许多共同的东西，又有自己的某些特点。据此对它进行研究就显得十分必要。由于前人在这方面的研究太少，基本处于空白状态。是以工作“无章可循”。而研究工程浩大。个人的力量难济于事。这就有待于集体的力量，有组织、有计划、有步骤、分工协作地去做，以期对广西客家的历史与现状，有一个比较全面和深刻的认识。愚意如此，未知朋友们以为然否？敬祈不吝指教。

注释：

①参看罗香林：《客家源流考》。中国华侨出版公司影印本，1989年，第4页。

②黄节：《广东乡土历史》。上海国学保存会，光绪三十一年。

③乌尔葛德：(R.P. Wolcott)：《世界地理》(英文版)，上海商务印书馆，1920年。

④请看《逸经》第十三期载王斤役：《福建云霄之瑶壮》，内有“瑶壮即今日之客族”说。《逸经》第二十四期载陈隆吉：《“瑶壮即今之客族”说驳议》；第二十五期又有憾庐写的《客族、瑶壮、及闽南民族》参与讨论。

⑤亦有以汝南、下邳、广陵等为堂号的。

⑥亦有以南阳、中山、沛国等为堂号的。

⑦亦有以河间、弘农、东平等为堂号的。

⑧后引语见林达泉：《客说》。

⑨三州指嘉应州、潮州、惠州。该文作于1908年7月，附于《新方言》之后。

⑩朱希祖：《客家研究导论·序》。

⑪山古布衣：《客家词汇保留着较多的中原古音》；李欣：《漫谈客家话》。俱见《客家》杂志，1994年第三期。

⑫陈运栋：《客家人》，台北东门出版社，1988年第六版。

⑬高贤治主编《台湾风土集刊》之一种，1986年台北众文图书公司印行。

⑭《已亥杂诗》，见《人境庐诗草笺注》（中）。

⑮见陈运栋：《客家人》，第150页；邓迅之：《客家源流研究》第244页。台中市天明出版社，1982年。

⑯参看《始兴黄氏五修族谱》、《蕉岭程官部黄氏族谱》，见罗香林：《客家史料汇编》本编《族谱中之客家源流》。香港九龙中国学社，1965年。但《蕉岭程官部黄氏族谱》记黄峭“生五代间，戊寅正月十五日午时”。以之与科考中式和置酒邀亲友训子时间相校，疑误。

⑰罗香林：《客家研究导论》说：广西客家“大体皆是明清初年自广东搬上去的”。见第97页；邓迅之《客家源流研究》说在明末清初。见第123页。大陆学者亦多本此。

⑱刘介编纂：《广西通志稿·社会编·氏族》，1949年6月油印本。唐代，今博白县为南昌、建宁、博白、周罗四县地。

⑲罗香林：《客家史料汇编》本编《族谱中之客家源流·温氏》。

⑳周去非：《岭外代答》卷三，《五民》，商务印书馆。

㉑李万英：《上院李氏族谱·序》，乾隆十一年；秦能益：《博白姓氏源流略述》，见《博白史志》第5期，1987年。

㉒俱见刘介：《广西通志稿·社会编·氏族》。

㉓《三江侗族自治县志·民族志》第一章，《族源·姓氏》第二